



选择的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

刘晓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晓波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装帧 袁银昌

·思想者文丛·

选择的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

刘 晓 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8,000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208-00120-0/B·24

内部发行 定价 1.85 元

自序

《与李泽厚对话》的第一部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在《中国》杂志上发表后，我就想再做些补充，并开始写作第二部分。此书的出版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既是与李泽厚的对话，也是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证明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存在价值，也证明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崇尚权威、惧怕权威、追随权威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成为记忆。

名为《与李泽厚对话》，但是全书几乎没有引用一段李泽厚发表过的文字，这在一般人看来大概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而我认为，在这样一本具有论争性的书中，引用对方的文字再多，断章取义之处在所难免，与其挂一漏万，不如毫无牵挂。因此，我基本没用引文。我想通过阅读对方的所有文字而得到的整体把握——也就是

目 录

〔 1 〕 自序

〔 1 〕 引子：反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

上 篇

感性·个人·我的选择

〔 14 〕 一 “积淀”的突破

现象·感性·个别·具体是无限的——理性
“积淀”的不断突破——冲击无意识的心理板结层
——从经验中抽象出先验本质是荒谬的二律背反
——审美的视野永远在理性的疆界之外——自
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利——审美是人对自身的
有限性、短暂性的突破和超越——审美的深度不
在于思想、理性、本质——孤独感、悲剧感、幻灭
感是知识分子必备的生命体验——审美应该是对
“积淀”的突破

〔 42 〕 二 个体主体性的重建

理性—社会与感性—个体的冲突——每个人

的彻底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人类经历了两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觉醒——人与自然的分离，个体与社会的分离——人的特殊性就在于能意识到自身的永恒的悲剧命运——人无法在根本上超越自然性、动物性的事实——一个人不应该成为毫无自我特征的等值

〔 60 〕 三 “民本思想”与“孔颜人格”的批判

民本思想是虚幻的群体意识——“民本”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延伸——虚幻的群体意识与将活生生的个人人格神化相辅相成，承担起宰割人性的使命——人的先天权力绝对平等——人的先天能力绝对差异——依赖性与独立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孔颜人格是自觉的奴性人格——感性的三个层次——自觉的奴性人格造就了两类人：愚忠者和伪君子——自我美化是奴化训练的第二天性——奴性就是无个性、无感性，就是无生命——反传统的核心就是重建全新的现代人格

下 篇

“天人合一”——奴化极境

〔116〕 一 美在冲突

美即和谐与美即冲突的对立——伟大的艺术都是悲剧精神的产物——喜剧是悲剧精神的极端表现形式——灵感是生命在长期压抑中的瞬间爆发——艺术家的成熟必然意味着他的创造生命老化——审美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发现并完成一次绝对特殊的生命——假如你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品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的纯粹形式——人生中最激烈的搏斗发生在灵魂中——审美是灵魂的冒险——人类无法逾越的鸿沟正是人本身

〔155〕 二 “天人合一”批判

逃避现实的最好办法：怀古与展望——人类最有深度和创造力的内在变化往往蕴含于危机之中——“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和”

——“天人合一”与国人的互补思维——“天人合一”与国人的实践——“天人合一”与国人的依赖人格——依赖性、奴性是功利化的人格——纯理论、纯艺术的追求是人类对自我超越的追求——卸掉传统文化的十字架

引子：反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

必须承认，在中国当代美学界，李泽厚的影响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每本新著都被争相阅读，他的某些观点常常被引用，特别是他的“积淀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作为一项基本原理而被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他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和荣格的“原型论”、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以及《百年孤独》一起，对近年来弥漫于当代文坛的“寻根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我也曾经象许多同龄人一样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他的著述每见必读，也确实从中获得过不少启示。然而，当我在几年前读到他的论文《孔子再评价》时，就有些不舒服，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则彻底粉碎了我心目中的李泽厚光环。不对味儿，太不对味儿了，难道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整体上彻底否定的传统文化真的象李泽厚描绘的那样诗意盎然吗？今日之

国人真的要振兴“新儒学”以重建统一的信仰吗？国人的心理结构真的就是不可改变的既成现实吗？中华民族的历次改革之举真的都要以复归传统而结束吗？难道孔子的幽灵就是国人根本无法摆脱的宿命吗？

为了澄清困惑，我又重读了他的所有文字（包括他1986年发表的《反封建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终于顿悟了，用“积淀”的目光审视传统，用整体主体性哲学重建传统，李泽厚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必然的。“积淀”既是他评价传统的理论基础，也是传统“积淀”的产物。“积淀”即合理这一命题象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的命题一样，是面向过去的、保守的。用“积淀”来规定美的本质，其保守性便越发明显。由“积淀”出发，他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必然多于否定，正象黑格尔对当时的德国现实一样。如果有兴趣，可以把马克思、尼采等人对德国现实的无情批判与黑格尔的肯定对比一下，从中也许能窥见人类历史上的某种相似性。李泽厚尽管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但他已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更重要的是，李泽厚的理论弱点，从根本上说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这种人格最鲜明的特征是：从来就缺少“怀疑一切”的批判目光，缺少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缺少为粉碎旧体系而敢于冒险的魄力，缺少敢于正视现实、改变现实、正视自身、否定自身的勇气，更缺少感性生命的强烈冲动，缺少悲剧感、幻灭感和紧迫的危机意识。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中的害怕冲突的中庸观念、廉价的理想主义、虚幻的乐观主义、保守的理

性主义、软弱的服从意识却浸透了李泽厚的所有文字。尽管他意识到了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但是他没有勇气承受这悲剧。而回避、逃脱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全面自居。历史告诉我们：凡精华是任何否定都无法毁灭的，相反，越是在彻底的否定和反传统之中，精华才能越加醒目，甚至只有在彻底的反传统中精华才能保留下来，而不被糟粕所同化。反传统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形式，它所否定掉的只是那些或迟或早要被淘汰的东西。西方的每次大变革都是反传统（文艺复兴是反对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但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如理性精神（包括实证、思辨、宗教等理性）、非理性狂迷、个人本位论、怀疑主义、反传统精神、多元文化等等却随着每次反传统而得到了丰富与深化。再如亚洲的先进国家，日本历史上的两次大飞跃都是由接受外来文化造成的，平安朝时代的“仿唐制”（中国化）带来的日本中古社会的一次大革新。“明治维新”时代的西化带来了日本近代社会的飞跃性发展，而在这种彻底的反传统中，日本民族所固有的那种“武士精神”恰恰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这也就是说，在变革的时代，保守性最强的就是所谓的全面，它要比极端的“国粹派”更为可怕，因为它更容易适应大多数人的心理需要。——想变革又怕天塌地陷。因而折衷是最好的办法，能够使人在精神上获得平衡。而每一个旧时代的灭亡、新时代的诞生都要以打破这种精神平衡为代价。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无法全面，人的有限和宇宙的无限决定了任何个体在面对世界时都无法做到全面。全面只是虚幻的自我感觉、自我安

慰，是为了逃避恐惧而自造的自欺欺人，因而也是一种惰性极强的人类心理，特别是在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的时刻，不敢正视自身、否定自身的人必然要有所保留，走向全面。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精神变革在理论上需要的恰恰不是全面，而是片面；不是调和中庸，而是走向极端的肯定与否定。人类精神上的先导永远是深刻的极端，对于旧传统更是如此。庄子、李贽、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鲁迅、萨特……这些以反传统著称的伟大思想者，没有哪一个不是走向极端的。相反，凡是向现实妥协、以维护传统著称的思想家，大都是“全面”的，孔子的中庸原则、黑格尔的正反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现当代中国，孔子与黑格尔的结合堪称东西合璧的精彩创举，儒化了的黑格尔是中国思想界不是权威的权威。

我认为，即便只从逻辑的角度讲，从我们天天高谈的辩证法角度讲，传统必然意味着反传统，传统一词便蕴含有自我否定，而没有自我否定的任何东西都是僵死的或虚假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凡是可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就大多是已经形成了的封闭体系，它的惰性必须通过彻底的否定才能打破，而不封闭的传统只能是反传统的传统。而且，一种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绝不是好坏参半、三七融合的结果，而是它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整体所具有的特殊性，每个民族的偏见往往是自身文化的特殊性的支柱。假如西方人不把个性、个人本位论推向极端，中国人不把群体、社会本位论推向极端，那么中西文化的差异何在呢？因此，对于整体、对于特殊性来说，任何全面、一分为二都无济于

事。文化不是烂苹果，剜掉一块还可以吃。文化作为人的创造象人自身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一个文化传统的整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精华浸透着糟粕，糟粕包含着精华，抽掉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将随之灭亡。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去对待传统。如果从轮回的角度去看待人的生命，就会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统；而如果从一次性完成的角度去看待人的生命，就会认为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之精华。在这里，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决定性因素。虽然现在就想一夜之间摆脱传统文化的遗传因袭是一种妄想狂，但是中国民族的落伍的痛苦现实使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彻底的反传统。我们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需要，以我们的时代所具有的不同于过去的特殊的性格、气质、心理、偏见和局限去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立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并不是过去的和未来的真理。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西方现代人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恰好反证了当代国人需要怀疑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各以对方的文化体系作为自身的参照系和反传统的武器，并以此来粉碎自身的传统。

理解了这些，也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那么推崇尼采、进化论和《苦闷的象征》。因为尼采是偶像的粉碎者，是个性自由的象征；进化论是新陈代谢、自由竞争的象征；《苦

闷的象征，是感性生命、潜意识骚动、人生悲剧的象征。而这三种象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禁忌。鲁迅之伟大就在于他反省传统文化之时所得到的答案是“吃人的历史”这种极端的结论，他在目睹这桌每个国人都在吃人和被吃的筵席之后，对传统产生的只有幻灭和绝望。有人会说鲁迅太残酷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怎么会弄到用“吃人”二字概括的可悲程度。然而，天才如果不与残酷结伴就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总要在毁灭中建设，总是把沉睡的人们从甜蜜而虚幻的梦中唤醒，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而真实是最残酷的。哥白尼在打碎“人类中心论”的幻想时是毫不留情的；马克思在彻底否定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时也是冷酷的；弗洛伊德对“性”的发现曾招来了多少人的疯狂诅咒……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最残酷的往往是人类最不愿意正视而又必须正视的东西。在当代中国，特别需要鲁迅式的极端和残酷，尤其是在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任何折衷、调和的态度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妥协，最后只能被同化掉。

现在也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否定传统是行不通的，因为走向极端的否定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当代文化的出路不在彻底的否定中，而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之中。——对于这种批评我只想谈，“五·四”新文化的彻底否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表层的，而且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反封建的主题并未延续下来，十几年、二十年的启蒙对于几千年的传统来说真是太短暂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传统文化。如果反封建的主题没有因主观上中国知识分子

的人格弱点和客观上的救亡运动而中断，那么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启蒙便大有希望。如果与西方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反传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到法国大革命为止，西方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是持续不断地反传统。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反传统运动都象流星一样一闪即逝。换言之，“五·四”运动的中断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剧。总结“五·四”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的折衷态度，而应该是开展一场长期的彻底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也许，这是世界文明史上一场极为艰难、极为罕见的思想启蒙，它的长期性要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传统的革新运动。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敢于付出代价。倘若不为思想启蒙付出代价，就要为妥协付出更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构成了反封建主题中断的最内在的原因之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论争，大多数要求改变现状、反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多么坚决，也不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多么严酷的批判！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最深层的、最内在的三大支柱——民本思想、孔颜人格、天人合一——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一种流淌在血液中、浸透到人格里的依依恋情。且不论“中体西用”在骨子里是一种经过装饰的卫道之说，即便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所要求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仍然是传统文化的最深层。例如，孙中山所提倡

的自由首先不是个性的、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全民的自由，“天下为公”“博爱”等指导思想就是“民本思想”的改头换面。事实上，离开了个性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民族的、全民的自由只能是抽象的、虚幻的口号。再如郭沫若，他在反封建的代表作《女神》中所追求的凤凰涅槃的最高境界“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仍然是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而屈原人格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闻一多甚至把屈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

再从时间上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琴南等人开始时都充当过启蒙的先驱，但到后来又不同程度地走向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大多数主张革新图强的知识分子在人格上并没有完全、或者根本就没有摆脱士大夫性格，“中体西用”是一种潜含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的要求。李泽厚也不例外。尽管他提出要“西体中用”，但他对民本思想、孔颜人格、天人合一的肯定，说明了他在骨子里仍然是“中体西用”。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封建更多是表层的、知识上的，而很少是深层的、体验上的。他们大都是用封建文化的精华因素、进步因素来反对封建文化的糟粕因素、落后因素，并以此来抵抗外来的先进文化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机械的、一分为二的阉割，对外来文化的表面接受而骨子里抵抗的心态，都表现出不敢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怯懦。这样的反封建只能走向其反面——经过调整之后的传统文化的再生和延续。正象屈原、杜甫等人对当时的现实批判、历代农民起义对现实的暴力反抗非但不是对传统文化的

否定，而是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强化的良性自我调解一样。用清官反对贪官、用民本反对等级的结果只能是贪官不绝，等级永存。因为这一切都是同一块文化土壤的果实。这是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所证明的、极其令人痛苦的事实。

反传统的最终妥协或失败，还在于社会整体的麻木和理想主义的心态。一旦知识分子的启蒙呼声得不到来自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阶层的支持，知识分子就会因孤独而走向绝望，复归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心态使他们企望在一个早晨把启蒙的思想变为现实，一旦来自现实的抵抗超过了启蒙的思想力量，他们便由速热的激愤走向速冷的淡漠。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在理想破灭后仍然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冷静，缺乏长期置身于绝境之中的韧性，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找到一种理想来进行自我平衡和自我安慰。也就是说，社会整体的麻木必然造成启蒙理想的破灭，而理想的破灭又促使没有理想就无法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去寻求新的理想，因而也就必然走向复归传统。

在当代中国，李泽厚的理论在这方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从他的理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孔颜人格”对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影响。通过与李泽厚对话，我要说明：在中国，反封建在思想启蒙层次上的关键仍然是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特别是知识分子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这种改造不仅是理论上的、学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生活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能否持续下去的关

键。而改造国民性在理论上所要做的，就是以鲁迅为起点，彻底否定支撑着传统文化的三大理论基础：民本思想、孔颜人格、天人合一。

换言之，以鲁迅为起点的反传统必须能够在深度上、广度上超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单纯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整体（政治、经济）的变革结合起来。这需要天才的个人，更需要大众的觉醒。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我也许会失败，但我并不悲哀，我为自己能够投身于反封建运动的激流之中而庆幸。